

热河金丹教起义与“扶清除邪”口号

——叶志超致季邦桢书札一通考释

张晓川 陆德富

近得见叶志超致季邦桢手札一通^①，述及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末带兵镇压热河金丹教起义一事，此前未见刊录，其内容对进一步了解金丹教起义及晚清民间反洋教斗争皆有助益，故加以释读分析。

士周仁兄大人阁下：

远违芝采，时切萧思。引睇吉晖，常劳梦轂，辰维勋祺，聿骏鼎祉延鸿，定符心祝。

弟前月十八日在古北口阅伍，迭接傅相暨前热河都统德文报，得悉朝阳教匪滋事，攻破县街，焚库劫狱，兼有金丹道、五圣门等匪到处响应，平、建一带均在危急。弟当即带马小队五十名，并派驻口练军左营韩管带，率领步队三百名，星夜驰赴热河。二十日午前到热，晤都统及道、府，筹办后路军需，都统以次均欲留弟在热，保护围庭。弟以兵贵神速，匪徒初起，人心不一，闻大军掩至，庶可慑其乱谋，爰即督队起行，于廿二日驰抵平泉。时平郡人心惶惶，居民铺户，逃散一空，贼人已将天主堂焚毁。闻大军骤至，始各散处乡村，逃匿山洞。弟派队搜捕，格杀三百余人，拿获百余名，分别讯问，有保者释放，无保者正法，复出示晓谕，准其改恶自新。于是平郡西南一带贼焰稍息，而各处告急文报纷至沓来，建昌危急尤甚。当派韩管带驰往救援，取道三十家子，鎗毙贼匪数十名，建昌始保无恙。此行幸未失机，若在热稍事逗留，迟行半日，则建、平两处非复我有矣。

及二十五日以后，傅相飭调马步各军先后到齐，未遑或息，即分路进剿。二十七日，韩管带并芦榆各练军于建昌五官营子与贼接仗，枪毙贼匪五百余名，内有总头目四名，夺获贼马数十匹，枪炮刀矛旗帜无数，道人法衣一件，邪书二本，其旗中画雄鸡一只，旁书“奉天飭命，扶清除邪”、

^①此札见《北京百纳2013年春季拍卖会“旧雨词翰”——信札、诗稿专场》，第256号。

“营”、“哨”字样。冬月初二日,又败贼于叶栢寿,击毙贼数百名。潘艺亭统铭字马队两营于冬月初一日败贼于平泉榆树林子,击毙头目二名,从匪八百余名,初四日又败贼于毛家窝铺,毙贼一千数百名,夺获马匹器械均各无数。由此兵分两路,潘艺亭统带铭字马队两营,副以傅弼卿步队一营,由赤峰一路进剿贼于乌丹城,聂功亭统帅芦榆、通永马步各营由平、建交界一带,进剿贼于上下长皋贝子府等处,弟由后路续进,接应两军。冬月十九日,行距长皋九十里碌碌科地方,接聂功亭来报,得悉十三、四日连获胜仗,十八、九日已将下长皋及贝子府贼巢次第攻克。弟昨亲至贝子府勘视情形。顷得潘艺亭来报,乌丹贼巢亦经攻克,从此大股贼匪均各殄灭,一律肃清,惟金丹道、五圣门等(原文此处误书一“处”字,自行点去)教流传甚广,诚恐余孽复萌,必须分布各军驻扎弹压,一切安置就绪,尚非十余日不能竣已。

此次军务起于仓猝,而塞外山路崎岖,加以严寒之际,将士转战于冰天雪地之中,无日不与贼接仗,辛苦艰难,不堪言状,尚幸奏功迅速,差可上纾宵旰之忱,至蒙民被害之苦,自平泉以至朝阳,袤地千余里,疮痍满地,十室九灰,目睹情形,寔堪悯恻,而善后事宜,非弟分所当为,亦非弟力所能为。已将大概情形咨明傅相,并热河都统,请赶紧设法抚卹,委道府大员妥为办理,未知能即准行否,但望早来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福也。匆肃布达,敬请勋安,惟希荃照不宣。愚弟叶志超顿首。

二

叶志超,字曙青,道光十八年(1838)生,安徽合肥人,时为直隶提督。早年随淮军刘铭传部征战,后为李鸿章纳入北洋淮军系统。光绪十五年(1889)任直隶提督,甲午战争中,率军赴朝鲜,参与牙山、平壤战役,败归革职,刑部定斩监候,后赦免。此札收信人“士周仁兄大人”,即季邦桢,字士周,道光二十三年(1844)生,江苏江阴人,时任长芦盐运使。早年以监生出身,报捐员外郎入仕,分发入兵部,曾派充实录馆详校官、军机章京等差使,出为天津道、长芦盐运使,丁忧起复后,于光绪十六年末再次出任长芦盐运使,后历任福建、直隶按察使等^①。

此信先言及叶志超于光绪十七年十月十八日在古北口阅操时,接到“教匪”起事,朝阳、建昌、平泉一带危急之报。“傅相”,即李鸿章,时为太子太傅、文华殿大学士、直隶总督。因其总督直隶,为金丹教起义波及地区,又为淮军系统首脑,所以被指派处理。“前热河都统德”,即前热河都统德福,清政府在获悉热河金丹教起义发生之后,于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初一,调察哈尔都统奎斌为

^①秦国经主编,唐益年、叶秀云副主编: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》(第6册)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7年,第309-310页。

热河都统^①，故称德福为前热河都统。光绪十七年金丹教起义实际上参与者成分复杂，如叶志超书信所言，即有金丹教、在理教和五圣门教徒参与，“五圣门”，亦称武圣门。

叶志超自谓闻报随即亲自带领马兵五十人，并派步兵三百人连夜赶往事发地点。率领步队之“驻口练军左营韩管带”，即韩照琦，道光十七年（1827）生，安徽合肥人，时以参将衔管带驻古北口练军左营。十月二十日叶志超率部到达后，自热河都统至道、府各级官员都希望其留下守卫木兰围场、热河行宫等皇家设施。不过叶鉴于形势紧张，当机立断赶往平泉、建昌，进行弹压。十月二十五日之后，李鸿章所调各路兵马纷纷抵达，分头进兵镇压。

叶志超书信中所提“聂功亭”，即聂士成，字功亭，时以记名提督驻防直隶。据叶札所记，聂士成其时统带驻守芦台、榆关的芦榆练军和驻守通州、永平的通永练军。“潘艺亭”，即潘万才，字艺亭，安徽阜阳人，时以副将驻防直隶。据叶札所记，潘万才此役统带者为铭军马队。“傅弼卿”，即傅廷臣，字弼卿，山东昌邑人，时为直隶提标城守营都司。

书信最后提及此役艰难，不仅事起仓猝，且寒冬进军作战^②。继而又言当地乱后景象凄凉，亟需善后抚恤，并称已经向李鸿章等咨报情况，表示了希望及时派员办理，殷切等待之意。

信札末未署具体日期，根据“弟前月十八日在古北口阅伍”一句以及称呼德福为“前热河都统”可以判断，此信当写于光绪十七年的十一月。信中提及的最晚日期为“冬月十九日”，则此札当写于十一月十九日以后。此外“弟昨亲至贝子府勘视情形。顷得潘艺亭来报，乌丹贼巢亦经攻克”一句，也有提示时间的作用，乌丹北大寺为各路教徒败退聚集所在，于十一月十五日后为潘万才、傅廷臣率军攻克^③，至于贝子府，则于十八日上午为记名提督聂士成、江自康等率军攻克^④，故均不早于“冬月十九日”。叶志超所谓“昨亲至贝子府”，当为其奏折中所称“于二十一日接禀后，即带领旗、绿两营，亲军各小队前往……驰抵敖罕贝子府地方”之事，则“昨”为二十一日，此信当书于光绪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无疑。另外，东三省练兵大臣定安所奏“左宝贵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与直隶提督叶志超在敖罕贝子府地方会面”，也说明了叶志超在十一月二十二日，

①《谕著奎斌调补热河都统迅赴新任》，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：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，第十二辑，中华书局，1987年，第259页。

②叶志超在奏折中也称其初赴热河时：“正值人心惶恐，仓猝购办粮草殊属不易……大小数十仗，转战于冰天雪地之中，追贼于深山穷谷之内，风餐露宿，坠指裂肤”等。见《叶志超奏官军剿办获胜留兵弹压抚绥折》，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，第十二辑，第323页。

③《叶志超奏合攻乌丹城叠次获胜并拿获教首李国珍折》，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，第十二辑，第313页。

④《叶志超奏官军克复贝子府击破下长皋并请奖叙折》，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，第十二辑，第304页。

早已到达贝子府^①。

三

叶志超此札还透露,韩照琦带队在建昌之五官营子获胜,缴获军械旗帜等,发现上书有“奉天饬命,扶清除邪”等字^②。“奉天饬命,扶清除邪”标语口号的使用,且印布于旗帜之上,尤值得研究者关注。若说“奉天饬命”,还基本上与历史上起义军所惯用的“替天行道”等口号并无二致^③,则“扶清除邪”的提法,显然与义和团所提出的“扶清灭洋”有很大的相似性,是近代中国面临西方列强入侵时,异于传统的产物。就该口号的提出和由来,戴逸先生曾经作过梳理,早在甲午战争进行时,就有“兴华灭洋”口号出现在山东曹州、濮州和安徽颍州、亳州等地的报告。1898年春的大足教案中,提出了“顺清灭洋”的口号,还有檄文称“但诛洋人,非叛国家”。此后湖北和山东的反洋教起义中,分别提出了“保清灭洋”、“助清灭洋”、“扶清灭洋”等口号^④。日本学者佐藤公彦也认为义和团运动“直接继承的是四川大足教案的‘顺清灭洋’及直隶山东交界地区的义和团运动的‘顺清灭洋’”^⑤。将“扶清灭洋”与“扶清除邪”两相比较,“灭”与“除”意思相近,关键就在于金丹教起义所希望除去之“邪”究竟为何。

从金丹教起义的原因来看,蒙古贵族尤其是时为“昭乌达盟之长”的敖汉贝子达克沁激变所致乃其一端^⑥。不过,民众中反洋教的情绪也是起义的重要原因,根据德福的奏报,金丹教徒“自称善类,不抢害百姓,只与天主堂有隙,挟

①《定安等奏奉省援剿朝阳各军迭获胜仗折》,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,第十二辑,第321页。

②关于这次战斗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叶志超的奏折,其中提到了“夺获大炮三尊,贼马数十匹,抬枪、火枪、旗帜、刀矛、衣物无算”,但并没有详细描述旗帜上的内容。参《叶志超奏进剿五官营子等处教匪屡获胜仗折》,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,第十二辑,第261页。

③金丹教起义中还出现过“奉天伐暴”等旗号,其性质与之类似。见《崇善奏边外教徒纷扰蒙古地面派兵严防折》,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,第十二辑,第253页。

④戴逸、杨东梁、华立著:《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》,中国社科院出版社,1994年,第284页。

⑤佐藤公彦著,宋军、彭曦、何慈毅译:《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7年,第226页。

⑥关于敖汉贝子的欺压民众可见起义首领杨悦春的供词。《金丹道教首领杨悦春的供词》,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敖汉旗委员会、文史资料委员会编,韩殿琮、石柏令主编:《敖汉文史资料选辑·第6辑·重大历史事件专集》,敖汉旗经济信息中心,2002年,第32-33页。即便是倾向蒙古各旗的汪国钧都承认贝子“威势甚盛”,在光绪十七年六月本就“几至酿成巨变”,同时进入草原地区开垦的汉民与蒙民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。敖汉,即敖罕,贝子,实为贝勒,唯时人记述中常见“敖罕贝子”、“贝子府”,故沿用之。汪国钧著,玛希、徐世明校注:《蒙古纪闻》,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6年,第3、31页。

恨报仇,刻已焚毁天主堂数处”^①。西人的记述中也可见到金丹教起义波及锦州,蔓延直隶北部大片地区,当地教徒被杀之事^②。综合来看,起义者对蒙古贵族的不满存在于一些地区,而在更多地区,矛头是指向在华教会,亦可谓是一场反洋教的“灭洋”运动。另外,据起义首领杨悦春的叙述,攻击教堂的行动,以“建昌三十家子牌长林玉山为首”^③,而叶志超信中所言缴获旗帜正是于建昌的五官营子所得,故而更说明旗帜上的“除邪”应该主要针对基督宗教的在华势力^④。

书于旗帜的“奉天饬命,扶清除邪”一句口号,虽就其文字而言,不能直接与“扶清灭洋”产生联系,但通过分析起义动因及缴获旗帜地点,大概不难推断“除邪”正是指除去基督宗教势力,与“灭洋”相近。光绪十七年末金丹教起义所提出的“奉天饬命,扶清除邪”口号,早于学界所认识的“兴华灭洋”、“扶清灭洋”出现的时间。当然,“扶清除邪”与“扶清灭洋”口号之间是否存在历史上的传承关系,还需要进一步考察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张晓川,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

陆德富,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

①《德福奏平泉吃紧请兵速驰热河援剿片》,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,第十二辑,第250页。

②王栋译:《蒙古事件》,载《近代史资料》,第82号,第159页。

③《金丹道教首领杨悦春的供词》,第35页。

④金丹教起义的参与者因其信仰源流和地域之不同,导致其立场与意图也不相同,佐藤公彦认为完全按照清末革命派的解释,将之统一视为反清团体,有失偏颇,此为的论。同时佐藤也注意到建昌的起义,主要原因在于对教会的不满。参见佐藤公彦著,白子明译:《1891年热河金丹教起义》,载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》第十一辑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8年,第138、145页。